

抗战时期大后方职业教育发展述论

邬蓉华

内容摘要 中国的职业教育起源于东部,抗战之前一直以沿海沿江地区较为发达。抗战军兴后,由于大后方经济的开发和文教重心的西移,国民政府、职教人士及教育、实业界均致力于发展大后方职业教育事业,遂使大后方的职业教育从规模到内容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值得记录和深思的一笔。

关键词 抗日战争时期 大后方 职业教育

抗日战争前,我国职业教育较为发达的省区均在沿海沿江一带,西北、西南地区的职业教育基础则十分薄弱。抗战军兴后,随着大后方经济的开发和文化教育重心的西移,职业教育在大后方曾一度蓬勃发展,形成我国职教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期。本文试就抗战时期国统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原因、概况、意义及其局限作简要述评,以就教于学者方家。

在抗战以前,因地方偏僻、交通梗塞,又迭受军阀割据各自为政之害,西南、西北各省基础教育十分落后,职业教育更为逊色。请看抗战前几年的一项统计:

表1 1934年各省市职业学校数及学生数统计表

	江苏	浙江	江西	湖北	四川	贵州	云南	宁夏	甘肃
学校数(所)	19	17	13	4	17	0	4	0	2
学生数(个)	2606	2140	1675	693	2348	0	888	0	154
教育经费(元)	391256	313135	342845	181963	230093	0	71294	0	36886

(资料来源:《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丁编,1934年开明书店印行,第121页、113页。)

由表可知,一方面,当时东西部职业教育发展极不平衡。江苏、浙江等省各有职业学校近20所,而贵州、宁夏等省竟无设置。从学生数目来看,江苏等省的学生数是甘肃等省的十几倍;在教育经费方面,甘肃等省更是远不及沿海各省。另一方面,西部各省之间,职业教育的发展也存在

明显差异。其时西部职业学校多集中在四川、湖北,教育经费的重点也在川、鄂两省,而贵州、甘肃、广西、宁夏等省无论校数、学生和经费都是十分有限的。

正是抗战给西部地区的职业教育事业带来了发展契机。随着战争初期的失利,中国东部沿海沿江的大部分领土相继沦陷。国民政府政令所及与坚持抗战全赖川、康、陕、甘、宁、青、新、黔、桂等后方省区的形势,西部地区战略地位骤然上升。而开发大后方资源所亟需的各级技术人才当时又极其匮乏。由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欠发达,职业学校在技术人才的培养中历来占重点地位。然而大后方落后的职业教育基础,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都是无法支撑抗战局面的。因为“供求相差甚巨”^[1]。鉴此,执掌政柄的国民党在其五届六次中委会议上作出决议:“目前职业教育之设置,尤应根据各种事业需要,加紧推进,务造就大量的专门人才。”^[2]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中再次强调:“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以应抗战需要。”^[3]把职业教育放到很突出的位置。在随后通过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中,更进一步规定:“为谋行政与国防及生产建设之沟通与合作,尽量推行职业补习教育,使各级干部均有充分之供给,俾生产机构早日完成。”^[4]

遵循上述方针,国民政府教育部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大后方职业教育的办法和措施。

(一) 厘定“国立职业学校”制度

民国以来,职业学校的设置都是“以地方设置为原则”^[5]。但因职业科目种类繁多复杂,地方的财力又属有限,遂致教育设备落后,师资延扰,杂乱无章,举步维艰。在抗战这一特殊的环境下,新的困扰不断发展。如许多职教科目,象护士、助产士、土木工程等或许并非地方的迫切需要,而就整个国家的抗战而言,则这类人才非设法储备不可。有鉴于此,国民政府始创若干国立职业学校。到抗战结束时,共有“国立四川造纸印刷学校、国立商业职业学校、国立歌剧学校、国立高级机械学校等共14所”^[6]。1938年2月,教育部颁发《国立中学暂行规程》,将国立中学分成中学、师范、职业三部。而且在中学课程中,增加生产及战时知能等科目。同年12月,颁发《国立中学增设职业科办法》,国立中学开设职业科。国立中学的设置,打破了民国以来职业培训机构附设于普通中学的局面,使职业教育趋于“独立化”、“专门化”。而在普通中学和师范学校中增设职业科,又表明职业教育开始注重同其他科目的融渗贯通,有机结合。“独立性”兼顾“融渗性”,是我国职教历史上一个突破性的进展。而这种层层推进职业教育体制与过程的情况,也恰恰表明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职业教育的倡导和重视。

(二) 将职业教育普及到县市

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大后方的资源,充分运用大后方巨大的人力和技术财富,职业教育亟需伸入农村,以造就更多的有用之材。根据国民政府的部署,当时由各省教育厅会同建设厅、民政厅首先派人到各县市调查,详细了解当地主要农工业及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产品及其供求情况,然后分类编制统计。依据统计结果,国民政府在1938年7月颁布了《创设县市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实施办法》,厘定出这些地区最急需而又最缺的职业,再根据具体的资源情况,“分别急缓,决定学校的地点及科目”。并规定:“以学校和生产机关合作办理为原则。”^[7]科目一般为农艺、农产制造、养殖、纺织、木工、应用化学、印刷等项。职教各科均强调实习,规定:“各科课业分配中实习至少占50%。”^[8]为尽量拓展办学的影响与效益,各职业学校还经常在所在县市各乡举行短期讲习会、讨论会,设置短期职业训练班,“就各地情况,进行编织毛袜、手套及其他用品,以俾抗战”^[9]。1944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公布了《短期职业训练班实施办法》,规定:私人或团体如因社会

或者其所办企业需要某种技术时,可“自行举办补习学校或委托学校举办”^[10],并先后在川、滇、黔、桂、陕、甘等省指定县份试办。由于实行了上述举措,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职业教育一度普及到城乡基层,其科目的设置又直接切合地方的实际需要和抗战当务之急,故颇受各方欢迎。

(三) 扩大职教专业,指定专校培养技术人才

为加强中等职业学校同高等院校之间的联系和培养高层次人才,1939年1月,教育部颁发《特设各种专修科办法要点》,规定“高等学校可特设专修科,教授应用科学”^[11]。当时指定中央大学、西北大学等14校开设职教专修科,设工、农、医、商四大类,含电讯、汽车、采矿、机械等12个专业,计20个班。这一时期,因文教机构和工厂、企业麇集后方,需大量建房,加之敌机轰炸造成大量房屋建筑坍塌,使土木工程量大增,国民政府教育部乃在1940年指定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国立同济大学附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湖南省立第一职业学校等9所基础院校“增设中等机械电机技术科”^[12]。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军的狂轰滥炸与封锁使国统区的铁路、公路损毁严重,运量锐减,川江航运日渐成为大后方交通运输的主干,当时军队运输,军粮调拨,生产和生活所需物资,都严重依赖水运,因此加快水利建设,推广水利教育又成为当务之急。教育部指定办土木科有成绩的职业学校“设置中等水利科”^[13],依此开办的水利学校,到1947年共“5校28班”^[14]。1944年,为加强海事教育,又专门增设了海事一科,将职校分类改为农业、工业、商业、海事、医事、家事及其他诸类,职校的门类更加多样化。

虽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增设职业科目在主观上有很强的应战性和被动性,但是客观上毕竟改变了民国以来我国职业教育以工商为主,其余科目少且单调的局面,从而在科目的实用性和多样化的方向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四) 大力推行职业补习教育

为扩大和深化职业教育的范围,最大限度发动民众,“增进都市职工知识技能,服务道德及改良乡村农业与手工业”^[15]。1939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飭令各省教育厅推行职业补习教育。一方面各级职业学校须利用原有设备和人才开办与学校性质相关的补习班。如重庆补习学校开办职业青年星期讲座,一年中举办44次,听讲人数1.9万人;中华职业学校渝校还举办过一年制的会计班,著名红岩革命烈士江竹筠就是这个会计班1941年度的毕业生^[16];贵阳补习学校亦招收学校附近的民众,义务授课,并义务为工人补习文化;昆明职业补习学校举行过店员训练班,音乐、舞蹈进修班等等。另一方面,许多公私营企业、农场负责承办了各类补习班,以提高所属职员艺徒的专业技术、职业素养和文化知识。具体实施办法由该企业或厂矿的人数决定。凡职工人数在500人以上,就必须举办补习教育班。200人以上的厂矿,可以联合数厂办班。职工人数不足200人,就由附近教育机关办理巡回职业补习班,定期分赴各场厂进行培训和教育。

这些职业补习学校的学期通常为3—6个月,虽然每届招生的数目不多,但招生的频率很快,特别是重庆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和昆明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前者一年最多招生5次,后者三个月招生1次,如果连年不断招下去,累计应达到3万名以上。加上各类厂矿企业承办的训练班的学员数,当时国统区职业补习班的总规模和影响是相当可观的。1945年董必武同志在延安做报告,谈及后方职教事业时说:“多次举办长期或短期训练班,学员数量不下十万人。”^[17]这就使成千上万的厂矿职工及其子女获得了扫盲读书的机会,而且也提高了他们的职业技能。又因其课程中抗战宣传和战时训练占很大的份量,所以这种职业教育也具有鲜明的抗战时代特征。

(五) 加强和完善职教奖励措施

尽管抗战期间,由于前线吃紧和敌寇厉行封锁,后方物资、资金极度匮乏,但国民政府在困窘中仍拨出专项经费,颁布了一些奖励措施来鼓励兴办职业教育。如1940年教育部颁发了《教育部津贴职业学校专科教员及导士薪给暂行办法》,对职校优良技术教员、导士提高薪给。再如1943年颁布了《国立职业学校职业科目教育员补助办法》,又规定对职业学校、国立中学职业部校长、各主任技术人员、教职员、学科教员,除工资以外,给予工资数的20%—50%补助金。这些措施对于稳定职教师资、调动职校的办学积极性,无疑也是有一定助益的。

国民政府提倡职校的职业科教员之间进行学术研讨。还对一些办理职业学校、训练班、补习班成绩突出的工、农、商、团体酌予奖励。

在抗战艰难时期,为鼓励优秀青年投考职业学校,国民政府曾规定“职业学校学生公费名额至少占30%,农、工、医科职业学生享受公费比例为80%,商科为40%”^[18]。这种相对优越的条件吸引了大批好学而贫寒的青年,一度在后方形成报考实用职校的热潮。

以上各端,无疑有助于抗战时期大后方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

二

抗战时期大后方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有国民政府一度大力提倡这个因素,还得益于大后方有关人士的鼎力推进与高校内迁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为职教事业艰苦奋斗

黄炎培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奠基者。虽处于抗战烽火中,他对推广职业教育的努力并没有放松。他认为在此国家生死存亡之际,职业教育的新使命是“矢忠矢孝,即知即行,以手脑贡献于国家民族的强有力的保卫者”^[19],号召青年“把人与物的力量联合起来,构成整个国家力量,建立国防”^[20]。

黄炎培一方面积极宣传他的职教思想和理论,一方面四处奔走,为发展大后方职业教育作了大量的组织工作。抗战期间,他和职教社同仁们不仅在重庆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中华函授学校及各种职业指导所、云南昆明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中华业余中学、中华小学,在大后方各地掀起了一股兴办职业学校的热潮。为了开设这些学校,黄炎培和职教社同仁皆不遗余力,克服了重重困难。仅以中华职业学校渝校为例。除黄炎培、江问渔等人四处募捐外,还成立了建夏企业公司,使用由沪迁渝的一些设备代客加工零部件,以筹措办校基金。该校校长贾佛如为向国民政府申请一点补助费,“往返行政院竟达七十二次之多”^[21]。

作为中国职业教育的肇基者,黄炎培和中华职教社同仁积累的办学经验及其抗日救亡的空前热忱,无疑给大后方的职教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大后方职教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二)地方教育界人士为振兴地方教育所作的努力

1938年,堪称内地教育“干才”的郭有守临危受命,出任四川省教育厅长。为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郭有守把对中学教育、职业教育的调整作为当时四川教育的计划重点。鉴于农业在四川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培养有志愿且有能力深入农村服务的专门人才,也就显得尤为迫切。所以,郭有守首先在四川万县、宜宾、遂宁、眉山、巴中等地各增设了一所农业学校,为当地培训了大量技术人员。为解决流亡到大后方的沦陷区青年和四川城乡学子的升学、就业问题,他还多方奔走,增设了省立职业中学、省立成都制革职业学校、省立江津陶瓷职业学校、省立内江实用

职业学校、省立戏剧学校、乐山蚕桑学校、万县高级职业学校等一批职业学校,带动了四川地区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其影响辐射到整个大后方,对西部地区职教事业的一度繁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示范作用。

(三)西部地方实业家以实业兴职教

抗战时期,一批西部地方实业派人士出于拓展实业、用人孔急的需要,也纷纷出资出力,以其实业为后盾,致力于职业教育。较突出者如川省航运大王卢作孚。卢一贯认为:“要救国,必须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又须兴办实业,以实业基础来振兴教育。”^[22]正是为了实现教育和实业的结合,卢作孚一直关注所创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学校化,高度重视公司职工的教育训练。他斥巨资设置图书馆,组织图书会,并延请社会名流到公司给全体职工上课、演讲,还筹设了水手训练班,以加强职工教育训练,终使民生实业公司不但成为旧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航运企业,而且成为教育和实业相结合的一个典范。卢作孚又以此为基础,先后在重庆创办了民众学校、船头学校、力夫学校等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 10 多所职业学校。到 1949 年底,卢作孚主持的北碚管理局,属下共有学区 124 个,民众学生共 12673 人,历届毕业生 27354 人,占管理区所属失学成人总数 6 万人中的 60% 以上^[23]。再如云南富滇新银行董事长缪云台,1940 年 7 月创办了云南银行专科学校。抗战期间,共招收高中毕业生 300 人,全部实行协作制的教育方法,即学习——工作——再学习——再工作,实际学习期限三年,其中有一年先上训练班,掌握基本知识,学期毕业后参加银行工作,有一定经验后再回到学校,续学两年专科,毕业后返回银行就职。按这种规格培养的人才,其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加上娴熟的金融技能,在大后方的银行职员中殊为突出。

(四)内迁高校在职业教育的质和量方面贡献卓著

抗战伊始,国民政府将一批重点高等院校迁往内地,一些国立职业学校如国立中央高级职业学校,国立中央高级助产职业学校等也都陆续西迁。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东部明显高于西部,故东部院校的到来极大地促进了西部地区的教育发展。一方面,内迁来的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需要受教育,刺激了包括职业学校在内的西部学校数量的增长;另一方面,流亡到内地的高等院校知识分子人数众多,不乏富有教育经验和学术专长的骨干。由于抗战岁月生计的艰难,其中有不少人还须在中学和职校教书,才能持家,连著名教授闻一多也兼职于昆明昆华中学^[24]。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加盟职教,在客观上提高了大后方职业学校的师资层次,自然也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院校内迁甚至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中也颇有影响。如云南的永宁纳西族,向以母系氏族著称,“至抗战期间,由于内地著名大学搬迁云南,使中小学教育,尤其职业技能教育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到外地升学的人数很多”^[25]。

三

抗战八年,大后方的职业教育以高校内迁为契机,荟萃了教育界的精英翘楚,他们在国民政府和地方当局的支持援手之下,经过艰苦奋斗,忘我耕耘,终使我国的职教事业在艰难的抗战岁月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各地职业教育机关,风起云涌”^[28],即为当时盛况。

抗战时期国统区职业教育的概况,如表 2 所示:

表2 1936-1945年全国职业学校数及学生数、毕业人数统计表

学年度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学校数(所)	494	292	256	287	332	344	359	383	424	576
班级数(个)	1916	1206	1240	1313	1568	1709	1988	2212	2496	3530
学生人数(人)	56822	31592	31897	38977	47503	51557	61009	67009	76010	102030
毕业人数(人)	10294	7023	6698	5644	7329	10309	12253	13932	14030	18764

(资料来源:《第三次中国教育年鉴》,台湾正中书局1957年版,1222—1224页。)

由上表可见,职业学校校数及其毕业生数1937年、1938年因战事影响,呈减少状态,尤其是1937年减少甚多,从1939年、1940年起呈逐年增加趋势,至1945年已超过战前,若考虑到此时国统区面积远逊于战前这一因素,那么大后方职业学校增加的绝对数量还是很可观的。至于职业学校的班级和学生数,只有1937年减少较多,其后大体呈稳定增长态势,至1942年已恢复到战前水平,到1945年,无论班级数、学生数,还是毕业生数均已大大超过战前水平。

抗战八年也是我国职业教育中等专科学校稳步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的时期。请看表3:

表3 抗战对职业专科学校发展概况

学年度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学校	24	27	28	33	46	47	44	55	52
教员	482	535	585	704	1075	1365	1790	1675	2,260
学生	3362	3997	5170	5241	7590	9709	11023	13640	13449
毕业生	605	311	356	805	1157	1523	2185	2628	2794

(资料来源:《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印行,1156页。)

显而易见,抗战期间国统区职业专科学校的校数、教员、学生、毕业生四种数字,均呈稳步递增态势,到1944年,学校数已比战争初期增长1倍多,而教员和学生数、毕业生数也都成倍增长。这些事实都充分表明,由于抗战的机缘,国统区特别是大后方各省的职业教育确实出现了一个蓬勃兴旺的发展时期。这一发展对中国职业教育事业的繁兴无疑具有重大意义。那么,它对于全民族抗战的作用和影响,又该如何估价呢?

(一)各职业学校培养训练了大批抗战急需的技术人员

职业学校有别于其他类型学校的显著特点,是教育的实用性强,造就实用性人才迅速。在抗战这一特殊背景下,职业教育的作用更为突出。如护士职业学校、农技学校,蚕桑学校、棉织学校、土木工程学校等等,培养的都是军需民用最紧缺的人才。总计大后方各职业学校先后培养出数以十万计的各类建设人才,他们作为朝气蓬勃、技有所长的生力军,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坚持抗战的各条战线。

(二)各职业教育机构吸收大量流亡师生,为稳定大后方局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抗战期间,由沦陷区迁入大后方的大中学校多达百余所,还有数以千计的与学校失去联系的师生,千里辗转,流离后方。他们报国无门,生计维艰,在衣、食、住、行和就业各方面均给国民政府造成巨大的压力,直接影响到后方的稳定。当此关头,职业学校的迅速扩充,正好为一部分沦陷区学子提供了求学的机会,也为一部分失业教师解决了生计问题。如1942年,四川北碚地区设置职教科目的中等学校共8所,在校生共1730人,而外省学生即有261人;307名教师中,外省籍竟占125人,为总数的40%^[27]。为数不少的流亡师生被安置下来,得以继续求学和工作,也稳定了后方,形成了“前方烽烟正浓,后方书声琅琅”的动人景象。同时也保证了全国教育发展的连续性。另外,由四川省教育厅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合办的职业指导所积极为流亡师生进行职业指导(职业社由陆叔昂负责),一经登记即逐个安排,教师到各校任教,学生到各校借读,确实为流亡师生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当年由江苏流亡入川的教师梁梦苏先生曾回忆说:“我为协助同乡人寻求工作,常到职业指导所与陆先生(陆叔昂)洽谈,均获具体解决。”^[28]

(三)大后方职业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中等教育内部结构不协调的状况

若干职业学校积极协助军需民用的科研与生产,为开发大后方经济和推动西部地区的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抗战时期,大后方一些理工学院、职业学校纷纷加强与工厂、农场等生产部门的合作。1939年5月,国民政府经济、交通、军政三部会同航空委员会制定了理工学院、职业学校与各种工厂合作的办法条例,以增加军需生产,这一尝试成效显著。例如在大后方交通运输建设中,如在湘桂、成昆等铁路干线和滇缅、成广、成渝、成兰、汉渝等公路以及大后方的各种军用机场的建设中,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校的职业专科学生大量被征调作为工程技术人员,参加各种工程的勘测、设计,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艰苦浩大的工程,为疏通大后方的交通运输,打通国际交通线出力流汗。一些迁徙到内地的学有所长的应用技术专家也纷纷在职校任职,如省立成都制革学校校长张铨,同时又是华西大学制革系主任;内江实用职业学校校长魏岩寿,亦兼任内江酒精厂厂长。直到解放初期,蜀中各生产战线中层科技干部出自职校毕业生者亦不在少数。这些职教师生对开发建设大西南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也要看到,大后方职业教育是在国民政府“抗战建国”的纲领下发展起来的。国民政府虽然采取了一些战时办学的应急措施,但“实施起来却仍然是老套子”^[29],其教育宗旨仍以修改过的“三民主义”为指导中心,以蒋介石所谓“战时须作平时看”为教育方针,并规定“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其主旨”^[30]。随着战事的发展,国民政府也不断强化对教育的控制,包括实行“党化教育”控制学校,强令学校教职员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用以德国训育制为蓝本的《青年训练大纲》来规范学生,“使学生耳听心唯,时时刻刻心领袖之心,行领袖之行”,“拥护国民政府,服从长官”^[31],从而加强对大后方教育的操纵和指挥。

综上所述,在抗日战争和国统区大后方这一特定的时期和环境下,我国内地的职业教育曾一度繁荣,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蒋介石为首的法西斯专制主义的窒碍之下,其发展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到抗战结束,当蒋介石集团把反共内战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时候,大后方的职业教育便无可挽回地再度黯淡下去了。

注释

[1][2]中共浙江省党史学会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

- [3][4]见《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一编第二章，8页、9页。
- [5]孙邦正著《六十年来的中国教育》，国立编译馆出版，台湾中正书局1971年印行，486页。
- [6][11][12][13][14][18]高奇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333页、334页、335页、337页。
- [7][8][9][10]见《教育部公报》，第10卷第7期、第10期、第15卷第1期。
- [15]《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八编。
- [16][21]黄嘉树著《中华职业教育史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68页、163页。
- [17]董必武著《大后方的一般概况》，《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9册，426页。
- [19]《教育与职业》第198期。
- [20]《国讯》第130号，1936年5月21日。
- [22]茅蔚然著《中国近现代各派教育思想与教育方法简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377页。
- [23]《重庆地方志》1990年5期。
- [24]萧超然著《北京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342页。
- [25]《云南少数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324页。
- [26]黄炎培著《抗战以来》，国讯书店1942年版。
- [27]《社会调查与统计》，1943年第2号，128—134页。
- [28]宋大鲁、程世平著《对抗战时期四川教育事业卓有贡献的郭有守》，转载《四川教育文化名人》，四川人民出版社，377页。
- [29][30]《中华民国教育志》，4页、5页。
- [31]《中等学校训育法令汇编》，164页、230页。

(邬蓉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指导教师侯德础教授,四川成都610068)